

古代“高考”那些事儿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选人用人，正是中国社会古往今来育人树人的一种成果检视。古代“高考”让“学而优则仕”成了刻在读书人骨子里的观念，现代高考则是让当代青年有学习深造的机会，更好地成为未来的国家栋梁。那么，形成于隋唐、废除于清末，有1300多年历史的古代“高考”——科举制度，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长达9天的考试

在科举制度之前，古代中国普遍使用的是举荐（察举）制度，但这一制度具有不公正和随机性。而科举制度是中央力量统一安排全国的分区统考，即相当于现代的“高考”，是古代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科举从开创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前后经历1300余年。

明朝是科举的鼎盛时期，考试分为四级，第一级是童试，中者称秀才；第二级是乡试，中者称举人；第三级是会试，中者称贡士；第四级是殿试，中试者赐进士出身。一甲3人，赐进士及第，分别称为“状元”“榜眼”和“探花”；二、三甲分赐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

考试每3年进行一次，乡试、会试各分3场，每场考3天。第一场写7篇八股文，第二场写1篇政论、5篇判词、1篇公文，第三场写5篇时政评论。

在南京江南贡院举行的乡试，考生自带干粮，不允许回家。江南贡院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科举考场，最多的时候有20644间号（宿）舍，每间号舍也就2平方米左右，上下分置两块木板，分别作为桌椅。考生睡觉时，要把两块木板拼接起来当床。

古书上讲的“进京赶考”指的是会试。会试由礼部主持，考场设在北京贡院。

古代“高考”竞争之激烈，远超现在。明清时期，录取人数最多的一次是雍正八年，一共406名，最少的一次是乾隆五十四年，只有96名。清朝光绪九年，参加会试的考生有1.6万多人，只有300多名考生得中，录取率仅为1.9%。

最重量级的“殿试”由皇帝主持，在太和殿前举行。除了现场答题，还要通过问话、观察等方式对考生进行综合考察。其中最隆重的是“传胪仪式”，即由皇帝宣布考生考试名次的典礼。

考生须带“浮票”着“制服”

古代考生需要长途跋涉去赶考，还要把所有必备的东西都带齐。

在所有考试用品里，浮票即准考证，无疑最重要，一旦遗失，将无法弥补。古代没有照片，准考证只能用

语言描述。比如：姓李名四，年龄20，中等身材，有胡须，考号治字31号等。

清制，乡试共分3场。每场都是提前一天点名发给试卷入场，后一天交卷出场。由于考生人数众多，每场都需要分路、分时点名入场。

预防考生作弊，古今一样严格。《宋史·选举》记载：宋太宗淳化年间，为“革考官窝私之弊”，采用监丞陈靖的建议，推行“糊名校核”法，即在试卷上糊住考生姓名、籍贯，决定录取卷后再开拆弥封。

“弥封”是在试卷交上来后，先由弥封官将卷面折叠，封藏应试者的姓名，编上红号，然后由誊录人员将试卷用朱笔誊抄，称为“朱卷”，最后再送考官评阅。放榜的时候，按取中的“朱卷”红号调取“黑卷”（原件）拆封，最后唱名写榜。

为防止作弊，考场进行全方位封闭，用一排排号舍把考生隔开。后来，又采取考生进号舍后即关闭上锁，考前洗澡并提供制服服装，以此方式来杜绝作弊。

诵文十通者才可应试

古代“高考”不限制考生年龄，但要求除了背诵《论语》《孟子》《诗经》《礼记》《左传》等原著外，还要熟读原文几倍数量的注释，并学习其他书籍。

唐朝设有童子科，10岁以下的孩子能通一经，并且《孝经》《论语》等每卷能诵文十通者，就可以入科学习。在宋淳熙元年，女孩林幻玉前去应试，就大纲内的43本诗书对答如流，被孝宗皇帝封为孺人。而元朝的童子科中试者都能进入朝廷的最高学府国子学。

清康熙三十八年己卯顺天乡试，以及乾隆三十五年庚寅江西乡试时，还出现了99岁高龄的考生，即秀才黄章和李伟。

此外，累世中家的家族性现象当时也经常出现。明代，殿试拿到名次考生最多的省份是江西，其中最著名的又属吉水县，以出翰林闻名全国，到了清代出得最多的则是江苏、浙江两省。

古代的“高考”录取通知书称为“捷报”，由专门的官员带上人敲锣打鼓前去报喜。捷报的样式大体相同，上面是欲飞腾龙，下面是云山雾海，正中央写有某某年高中乡试或者殿试第几名。考生收到后，都会郑重地贴在家里厅堂显眼位置，光宗耀祖。

历史上的状元

乡试第一称解元，会试第一称会元，殿试第一称状元。历史上一共出现过文武状元500多位，第一个状元是唐高祖武德五年的孙伏伽，最后一个状元是清光绪三十年的刘春霖。唯一的女状元是太平天国的傅善祥，可谓女中豪杰，她连中三元，不仅是状元，还是解元、会元；不仅是殿试第一名，还是会试、乡试第一名。500多个状元中，只有19个曾经连中三元，文状元16个、武状元3个。其中最厉害的是明朝洪武年间的黄观，他连中六元（县考、府考、院考、乡试、会试、殿试），都是第一名，年仅27岁，后任翰林院修撰，成为建文帝的重臣。

考生能考取状元的因素很多，其中考场上的书法能直接影响成绩。康熙三十年殿试，康熙皇帝就因对第二名戴有祺的书法极为欣赏，直接把他定为了第一名。

据中国日报网

复读不辍中进士

考生有金榜题名，就有名落孙山。古代也有不少复读成功的例子，还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如：明朝戏曲家、文学家汤显祖，第五次考试时才以殿试三甲第211名赐同进士出身；民族英雄林则徐三次参加考试，最后一次终于以殿试二甲第4名、朝考第5名被赐进士出身；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曾国藩，第三次参加会试才考取，殿试位列三甲第42名，赐同进士出身，后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

对古代的复读生来说，家里一定要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才能坚持下去。因为赶考费包括车马费、旅店费和饮食费，外加考卷以及考试装备如脂烛水炭、餐器、衣席等，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始于唐废于清的书院是当时最有名的高考“补习班”，分为私人和官办两种。史上非常厉害的补习班老师当属南宋理学家、文学家吕祖谦，他量身定制了一册模拟复习大纲及考题，考生如果能正确解答，大都可顺利通过考试。

无论一次考取或复读成功，对考生来说都是一件大喜事。“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首著名的《登科后》就是46岁的孟郊在公元796年（唐贞元十二年）第三次赴京赶考，终于得以登上进士第，于放榜之日所写，极度欣喜之情跃然纸上。

据中国日报网

落榜不失志的名人

●吴承恩（约1504—1582年）

嘉靖八年（1529年）吴承恩于龙溪书院求学，后在嘉靖十年（1531年）、嘉靖十三年（1534年）以及嘉靖十六年（1537年）这三次乡试中皆名落孙山，直至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方才补获一个贡生之位。

1570年，吴承恩自蕲州（今湖北省蕲春县）荆王府辞官归乡，至1573年完成中国首部长篇神魔小说《西游记》，遂被后人铭记。

吴承恩用一本《西游记》让怀才不遇的人明白：考场夺魁或许能赢得一时功名，但唯有挣脱现实枷锁的想象力，才能真正抵达文学的“凌霄宝殿”。

●蒲松龄（1640年—1715年）

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蒲松龄连获县、道、府3个第一名，年少即声名远扬。此后，在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清康熙二年（1663年）、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清康熙十四年（1675年）、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这八次科考中皆铩羽而归，直至清康熙五十年（1711年），援例获赠一个贡生之衔。

蒲松龄一生未跳出科举时代的“聊斋困局”，却以一支孤笔耗费近40年创作了拥有491篇志怪小说的《聊斋志异》，以鬼狐世界映照人间，撕破封建社会的虚伪面纱。

●李时珍（1518年—1593年）

嘉靖十一年（1532年），李时珍考取秀才，此后九年之中，三次应考皆未中举，遂随其父舍弃儒学转而从医。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李时珍着手编纂《东方医药巨典》《本草纲目》，历经27载，行程万里，三度修改文稿方得以完成。

李时珍未曾金榜题名，却以一双草鞋、一杆药锄，在深山旷野间写就了跨越时空的生命之书。从《本草纲目》泛黄的纸页里，至今仍能听见一个医者对自然万物的谦卑叩问：“窥天地之奥，达造化之极。”

●王守仁（1472年—1529年）

明弘治六年（1493年）、明弘治八年（1495年），王守仁两次会试皆名落孙山，直至明孝宗弘治十二年（1499年），获赐二甲进士第七人之名衔。

王守仁因触怒宦官刘瑾被贬谪贵州龙场，于蛮荒之地悟道，以“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心学三剑照亮东亚的精神火种。当现代人困于“内卷”与“焦虑”时，那个龙场石棺中的声音仍在回响：“人人心中有仲尼”。

●杜甫（712年—770年）

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天宝六载（747年），杜甫进士科两次落榜，于是客居长安十年献赋求官，写下“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辛酸。

于安史之乱中，冒死投奔唐肃宗，获授左拾遗一职，未及一月便被贬归乡，此后弃官漂泊。在“三吏三别”之中，他记录下战争所带来的创伤，于成都草堂暂且栖身之际，仍怀有“安得广厦千万间”之宏志。

本报综合



唐代的科考场景。

资料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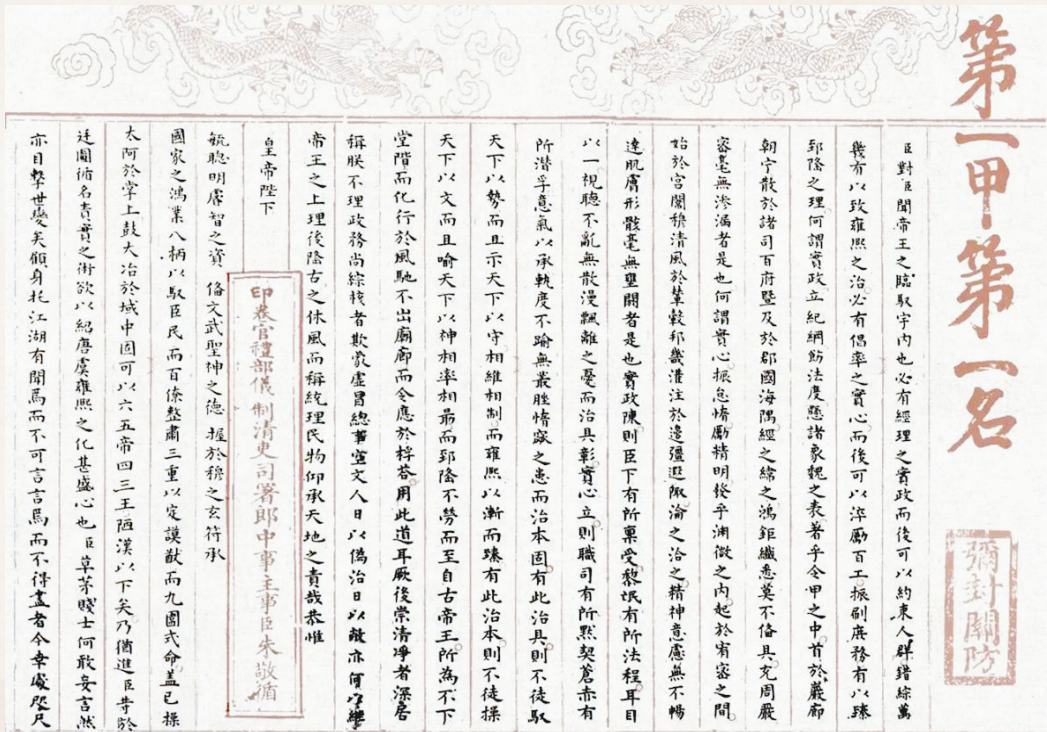
明代《徐显卿宦迹图·棘院秉衡》，展现了当时贡院科考考试监考的场景。

资料图片

3. 西方国家借鉴中国科举制

现代西方文官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受到了中国科举制直接而深刻的影响。中国科举制对西方产生影响可追溯到16世纪。1569年，葡萄牙传教士克鲁兹所撰《中国游记》将中国的科举制介绍到西方。1583年，葡萄牙修道士胡安·冈萨雷斯·德万多萨所著《伟大的中国》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科举制的内容和方法，此书被译成多种文字，广为流传，激起了欧美人士对中国科举制的关注。英国是最早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1793年、1816年及以后，多次派外交使节到北京实地考察中国的科举制度。目前，西方学术界公认：现代西方文官制度源于中国的科举制。比如西方文官制度仿照中国的科举制，建立了考选制。这种制度强调通过考试的方式对候选人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进行评估并选拔官员，而非依赖政党关系或政治背景，以确保选拔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另外，科举制的公开性、广泛性也为西方文官制度带来了启示。他们在选拔官员时，也注重过程的公开、透明，确保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参与竞争，从而扩大了选拔的范围，提高了官员的整体素质。

本报综合



明朝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的状元赵秉忠的考卷是目前保存的唯一殿试答卷。其字迹娟秀、工整严谨，全文两千四百六十字，无一涂改。（局部）

资料图片

欧阳修成就“千年龙虎榜”

宋太祖确立了科举殿试制度。殿试时考生的答卷由考官先审，选出优秀的呈给皇上，皇上亲自阅卷。阅卷采用“双重定等第”法：每份卷子的等级由两个人先后审阅决定，前者评判还被封住，以防后者受其影响。

宋代对阅卷机制的另一重要贡献是恢复了弥封制，并在此基础上开创了誊录制度。也就是说，不仅对答卷的姓名等个人信息信息进行弥封，还要让专门的人把答卷抄录一遍，称草卷，进一步提升科举的公正性。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大文豪欧阳修对弥封誊录制大加赞赏，说它“使主司（科举

的主试官）莫知为何方之人、谁氏之子，不得有所憎爱薄厚于其间”。

嘉祐二年，欧阳修任省主考官。那一年真可谓是科举史上最辉煌的一年。388位进士中，24人在《宋史》中有传；9人官至宰相，如吕惠卿、林希、章惇等；苏轼、苏辙和曾巩跻身“唐宋八大家”之列，与主考官欧阳修一道名千古；程颢、程颐兄弟开创理学先河；思想家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浩气凛然……这些人对后世影响深远，这张榜单被誉为“千年龙虎榜”。

此外，欧阳修还很好地整肃了文风。作为诗文革新的倡导者，他非常反感当时在大学中流行的以险怪奇涩为荣的“太学体”文风。当他看到“天地轧，万物

茁，圣人发”这样云山雾罩的文字，批了“秀才刺，试官刷”几个字，意思是秀才的文章违背事理，考官就要刷掉，再加上“大批缪”（指出重大的错误或明显的荒谬），命人连文带批贴出公示。很多人因此下笔少了些空虚怪诞，多了些真情务实，让当时的文坛风气为之一振。

上述革新，欧阳修功不可没。他一心为国家社稷着想，能容有才之人。比如他曾有感于苏轼的年轻有为，叹道：“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这句话就是“出人头地”这个成语的出处。说起欧阳修在嘉祐二年的阅卷还有个插曲。当年，欧阳修本想把苏轼的答卷定为榜首，但因弥封誊录制，他误以为这份答卷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作。为了避嫌，将这份答卷列为第二。拆开糊名后，才知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苏轼。

据《北京日报》